

批評與回應

國民政府的三峽工程

● 智效民

基於那種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的迫切願望，中國有許多政治文化精英在「國」與「民」的問題上，總是更相信「國」的力量，即使是在最艱苦的戰爭年代，也要利用國家財政和國有資源去搞一些所謂利國利民的大型工程。1949年前後的兩個政府不約而同地熱衷於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便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近年來，學術界在中國計劃經濟和國營企業制度的起源等問題上，有許多可貴的探索，其中，刊登於今年《二十一世紀》程麟蓀和衛春回的兩篇論文，是這類研究的最新成果。程文通過對資源委員會的考察，發現自「九一八」事變以後，人們普遍認為國內外形勢已經不容許中國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自由資本主義的道路來發展經濟。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中國要想依靠私人資本主義與其他國家競爭是不現實的。因此國民政府只能以「發展國家資本、實施計劃經濟」的模式來加速中國工業化的進程^①。衛文則以1948年出版的《新路》雜誌為例，介紹了該刊撰稿人圍繞公有制與私有制、計劃經濟與價格機制、經濟平等與政治民主等問題展開的討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40年代中後期中國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對民主社會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不同態度^②。

基於那種趕超世界發達國家的迫切願望，再加上所謂「效率高」、「速度快」等未必真實的理由，中國有許多政治文化精英在「國」與「民」的問題

上，總是更相信「國」的力量，即使是在最艱苦的戰爭年代，也要利用國家財政和國有資源去搞一些所謂利國利民的大型工程。相比之下，只有胡適等少數人清醒地看到：人的認識是有局限的，因此「不輕易做一件好事，正如同不輕易做一件壞事一樣」，應該是政治家恪守的一個基本理念^③。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相結合的政治理念，卻很難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在這方面，1949年前後的兩個政府不約而同地熱衷於長江三峽水利樞紐工程，便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三峽工程的籌備工作是從1944年5月開始的。當時盟軍在歐洲戰場進入反攻階段，中國抗日戰爭也勝利在望。就在這樣一個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時刻，資源委員會副主任錢昌照邀請美國墾務局總工程師薩凡奇 (John Lucian Savage) 來我國考察長江，目的是要給戰後工業發展提供充足的電力資源。薩氏在國際上享有盛譽，來華後他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長壽龍溪河等地，隨後又在水利專家黃

育賢陪同下，乘木船沿三峽順流而下。考察結束後，他認為在黃陵磯可以築壩，並撰寫《揚子江三峽計劃初步報告》，詳細論證了工程方案、工程造價、綜合效益和中美技術合作等問題。

第二年5月，經國民政府批准，三峽水力發電計劃技術研究委員會正式成立，錢昌照任主任委員，三峽工程的勘察設計進入實際運作階段。當時抗日戰爭尚未結束，為了協調並調度各方面力量，由資源委員會牽頭，會同有關部門對三峽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測由資委會所屬全國水力發電工程總處負責，工程設計由美國墾務局負責，壩址鑽探由地質調查所負責，水文調查由揚子江水利委員會負責，社會和經濟調查由資源委員會負責。此外，美國方面還負責航空測量，並派高級工程師柯登(John S. Cotton)來華協助薩凡奇工作。據錢昌照回憶，到1947年4月，「各種攔河壩、電廠、船閘的比較布置，各部門工程的比較設計，已經做出；洪水量、水庫容量、航道深度等也有了初步計算。估計全部工程的主要設計圖紙和施工規範可於1948年底完成。」④

錢昌照說，根據薩凡奇的構想，為了預防氫彈襲擊，電廠要放在水下，大壩要能夠抵擋常規武器的轟炸。大壩建成後，由於壩身不高，發電能力為1,056萬千瓦，只需要淹沒萬縣，移民三十萬。三峽工程完成後，交流電供電範圍在方圓一千公里左右，最遠可將電力送到上海。除發電以外，還要辦幾個化工廠，並兼顧航運、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產養殖等方面，所以他認為「這是一個多元計劃」⑤。薩凡奇也說，這是一個好方案，長江水流一旦被控制，下游的湖泊就可以耕作，水澆地也可以擴大

四五百萬畝左右。至於該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以及其他一系列問題，當時並沒有考慮。

方案出台後，立刻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幸福》雜誌老闆來華時，曾不客氣地問：「中國有能力搞這麼大的工程嗎？」錢昌照沒有正面回答，卻說了這樣一句：「中國人是聰明的，有志氣，就要做這個大事，使中國人有自信心。」這口氣與1949年以後長期在中國內地流行的標語口號、報刊社論如出一轍。蔣介石在一次宴會上向美國朋友介紹三峽大壩時，還特意表示：「你回美後請向總統報告，大壩告成，將取名為羅斯福水壩。」⑥與此同時，剛剛在南京復刊的《中國青年》雜誌也在第二期以〈工業中國之序幕〉為題，刊登由資委會全國水力發電總處提供的一組圖片，介紹了三峽大壩建成後的情景。從這些圖片的說明文字中，可以看出當時的工程構想和設計水平。

其一：攔河壩正視，壩頂裝鼓門形閘門九座，自動調節壩後水位，左下端道路通至左岸地下發電間，右上端為水閘，一輪船已過閘上駛，壩身設出水洞二排，可調節長江下游水位。

其二：民船通過船閘時，先進入大水櫃排列成行，用巨型起重機吊起，移至閘門上游，即將大水櫃放入水中，民船由水櫃駛出。

其三：上游吊橋已開啟，一巨輪已過閘上駛，巨型起重機停放船閘右上角。

其四：閘箱深奧，閘門矗立其中，上下游水位相差五百呎。

其五：船隻經過船閘之另一方式，四部巨型起重機橫跨閘箱，已將中山號巨輪吊起，移至閘門下游，即擬放下五百呎至下游水位⑦。

三峽工程方案出台後，引起國內外的廣泛關注。美國《幸福》雜誌老闆來華時，曾不客氣地問：「中國有能力搞這麼大的工程嗎？」錢昌照回答：「中國人是聰明的，有志氣，就要做這個大事，使中國人有自信心。」這口氣與1949年以後長期在中國內地流行的標語口號、報刊社論如出一轍。

抗戰勝利後，資源委員會升格為部級機關，成為行政院直屬單位。錢昌照擔任該會委員長，興建三峽大壩成為他主持的一個重要水利工程。在籌備三峽工程的最初兩年裏，工程設計耗用了100多萬美元。假如再花100萬，1948年就可以施工了。就在這個時候，事情突然發生變化，主要與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辭職有關。

在這裏，有必要簡要介紹一下錢昌照這個人。錢昌照(1899-88)字乙藜，江蘇常熟人。他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Harold J. Laski)、韋伯(Sidney Webb)等人，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他在張謇引薦下用一年時間遊歷半個中國，拜訪了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他與沈性元結婚。沈女士是浙江嘉興人。她的大姐夫黃郛與陳其美、蔣介石關係密切，二姐夫是著名社會學家陶孟和。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錢昌照進入政界。一開始，他是外交部長黃郛的機要秘書，不久便擔任國民政府秘書，教育部常務次長，成為蔣介石身邊的紅人。「九一八」事變後，為了開發人力物力資源，爭取專家學者和社會賢達的支持，蔣介石成立國防設計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實際工作由錢昌照負責。1934年，國防設計委員會改組為資源委員會，由軍事委員會領導，管理全國的工業建設。在此期間，蔣介石一直兼任委員長，翁文灝、錢昌照擔任正、副秘書長。抗戰開始後，資委會脫離軍委會改隸經濟部，主任委員由經濟部長翁文灝兼任，錢昌照任副委員長，主持日常工作。當時資委會所轄企業一百多個，是國統區重工業生產、管理的壟斷機構。

抗戰勝利後，資源委員會升格為部級機關，成為行政院的直屬單位，錢昌照擔任該會委員長，負責全面工作。當時資委會的主要任務是接管敵偽企業、調整工業布局、拆遷日本工業設備(後停止)、編製重工業建設五年計劃。在此期間，興建三峽大壩成為錢昌照主持的一個重要水利工程。

按錢昌照的說法，三峽大壩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是一項「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工程。在他主持籌備三峽工程的最初兩年裏，工程設計「耗用了100多萬美元」。他估計，假如「再花100萬，1948年就可以施工」^⑧了。讓他始料不及的是，就在這個時候，事情突然發生變化。

這個變化主要與行政院院長宋子文辭職有關。1947年初，針對宋子文貪污腐敗的種種劣迹，著名學者傅斯年首先在參政會發難，隨後他又在《世紀評論》和《觀察》周刊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宋子文的失敗〉和〈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等文章，終於迫使宋子文下台。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在〈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中，多次提到資源委員會問題嚴重，不知這些話是否與錢昌照的自我辯解有關。因為在1946年9月，《觀察》第二期曾以〈錢昌照的擔負〉為題，刊登過一篇特約記者的通訊。文章開頭是這樣的^⑨——

「將國家資本叫作官僚資本是一種最大的污蔑」，從事創造國家資本十五年的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引者按：即委員長)錢昌照瞪着眼睛張大了嘴說道：

「我們這些人都是決定要作一輩子的。我們這些廠礦中國(引者按：『國』字似為衍文)應當沒有勞資問題，因為彼此都是公務員，同時也一律是公僕。我們自己沒有一文錢在我們的事業中間；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與此同時，他還反駁了國營廠礦是在與民爭利等說法。

對於這些問題，傅斯年的看法截然不同。他在上述文章中說：宋子文所謂國家資本，除了鐵路、民航、銀

行全由國家經營外，「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得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着，於是乎大體上在紊亂着，荒唐着，僵凍着，腐敗着。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傅斯年還說：宋子文「有時彷彿像是有政策的」，但其作風十分蠻橫，有「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物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因此他所謂國營，不過是「宋營」；而資委會的事業，又都是「無辦法，或非賠錢不可的」，因此他所謂國營，又「是『國賠』而已」^⑩。

至於資源委員會是否在與民爭利，胡適也有尖銳的批評。1954年胡借用朋友的話說^⑪：

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他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於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於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於靠攏，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係的。

這些話對於全面了解中國知識份子在此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思想狀況以及他們在所謂救國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等問題上的路徑選擇，頗有幫助。

另外，著名政治學家張慰慈和水利專家出身的沈怡對錢昌照也極為不滿。1938年底，正在資源委員會擔任購置室主任的張慰慈寫信對胡適說^⑫：

在所謂抗戰時期，決不是我們講建設的時候，因為所謂廠礦決非立時立刻可以辦得起來，等到辦了一半停止，不是前功盡棄，白費金錢？但乙藝先生一類人物只曉得海闊天空，亂吹亂唱，今天辦這樣，明天辦那樣，至於怎樣去辦，辦了以後又有怎樣影響，他們毫不計及，到了今年秋天，湖南湖北江西等處的廠礦就拆的拆，搬的搬，毀的毀，不曉得白費了多少金錢。可是經過了這樣教訓以後，他們還是不能覺悟，照樣的要買這樣，買那樣，還是大刀闊斧的去幹。但我卻不願意把有用的金錢由我的手裏白花出去，所以借了另外一個題目，打了幾個電報向資源委員會辭職。

沈怡是錢昌照的妻兄。他早年在德國專攻水利，回國後進入政界，擔任過交通部次長、大連市市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晚年時他曾撰文批評錢昌照，「認為資委會的主要負責人經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為此，錢昌照很不高興。1979年，寓居美國的沈怡得了癌症，希望與妹妹沈性元見上一面。這時，錢昌照已經是全國政協常委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委員了。據錢昌照說，沈性元赴美時，水利部託她將「三峽計劃」數據帶去，徵求哥哥的意見。當性元將數據取出時，被沈怡拒絕了。沈怡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時，我在

傅斯年認為資源委員會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普遍，因此所謂國營，又是「國賠」而已。胡適也有尖銳的批評，認為資委會把持中國的工業礦業，對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政治學家張慰慈批評錢昌照只曉得亂吹亂唱，今天辦這樣，明天辦那樣，至於怎樣去辦，辦了以後又有怎樣影響，他們毫不計及，不曉得白費了多少金錢。

宋子文下台後，錢昌照也提出辭呈，離開資源委員會，行政院就下令停止與三峽工程有關的一切活動。派到美國實習的五十名工程技術人員，回國後被迫改行；協助三峽工程的美國工程師薩凡奇，離開中國時也「難過得幾乎要哭了」。1949年7月，毛澤東會見錢昌照時說：「將來這件事還是要辦的。」

國外撰文認為幹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經性元反覆勸說，他才看了資料^③。

需要指出的是，錢昌照步入仕途後，一直與宋子文關係密切。他說：「我自認識宋以後，彼此之間的關係非常好。孔（引者按：指孔祥熙）、宋有矛盾時，我支持宋。當我在資委會的工作中同孔發生矛盾時，宋總是支持我的。」^④他認為，這是「我與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聯結起來」的基礎。錢還說，抗日戰爭中他在蔣介石面前失寵後，「和宋子文的關係就更加緊密」了^⑤。由此可見，錢昌照是「宋營」中的核心人物。

宋子文下台後，錢昌照也提出辭呈，於1947年4月27日離開資源委員會。錢氏一走，行政院於5月10日下令停止與三峽工程有關的一切活動。為此，錢昌照痛心地说：「兩年多的調查資料和國內外設計圖紙，成噸成堆」，存放在武昌的一座新建的小屋裏面；派到美國實習兩年多的五十名工程技術人員，回國後都被迫改行；至於那位著名的美國工程師薩凡奇，離開中國時也「難過得幾乎要哭了」^⑥。

錢昌照辭職後，在宋子文資助下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並與著名學者吳景超、劉大中等人創辦了《新路》雜誌。據說宋子文只知道有研究會，不知道有《新路》。1948年8月，錢昌照出國考察，並於第二年6月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安排下回到北平。至於他們甚麼時候開始接觸以及背後的隱秘，則不得而知。

1949年7月的一個晚上，毛澤東在駐地會見錢昌照。他們談論的範圍很廣，在談到長江水利開發計劃時，錢詳細介紹了三峽工程籌備過程以後，對毛說：「國民黨政府太不像話，花了不少人力財力進行籌備，而

1947年4月底，在我離開國民黨政府不到兩個星期，就停辦了。」毛說：「將來這件事還是要辦的。」^⑦後來周恩來也向錢昌照表示，這件事「新中國一定要辦」^⑧。

註釋

① 程麟蓀：〈中國計劃經濟的起源與資源委員會〉，《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4年4月號，頁88-100。

② 衛春回：〈四十年代自由主義學人理想中的經濟制度〉，《二十一世紀》，2004年4月號，頁101-108。

③ 胡適：〈述艾森豪總統的兩個故事給蔣總統祝壽〉，《自由中國》，第十五卷九期，轉引自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2553。

④⑤⑥⑧⑩⑪⑫⑬⑭⑮⑯⑰ 錢昌照：《錢昌照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頁81；81；82；82；161；122；88；82-83；105；82。

⑦ 資源委員會：〈工業中國之序幕〉，《中國青年》復刊第二號（南京，1947），封二。

⑧ 《觀察》，第一卷第二期（上海，1946年9月7日），頁19。

⑨ 傅斯年：〈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觀察》，第二卷第一期（上海，1947年1月3日），頁6-7。

⑩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冊，頁2374。

⑪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香港：中華書局，1983），頁392。

智效民 1946年生於山西太原，現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近年來主要興趣在研究中國現代知識份子人格與命運。著有《心理的單間》、《思想操練》。另外，《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往事知多少》即將出版。